

世界文化关照下的现代中国学研究

——兼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向——

李喜所

〈南开大学〉

现代中国，或曰近代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东方和西方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是以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极不平等的方式完成的，但中国已融入了世界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这种变化的起点，到60年后的八国联军战争，即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与世界已经变得难解难分，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文化的变动都可以找到西方世界乃至东方日本的影子。故而，立足中国，探讨世界；着眼世界，解读中国，既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种无法抹去的历史真实，更是一个不可或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问题。质言之，不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现代中国，很多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历史现状出发，近一个世纪以来，近代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都试图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找到一条主线，创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术大家费正清教授所提出的“冲击反映”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反映。这个富有概括性的总体论断曾为很多学者所推崇。但也受到相当多的研究者的责难和批评。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一是认为这种模式忽略了中国社会本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功能，仅仅是被动的反映而已；二是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冲击者是正义的使者、文明的化身，被冲击者则理所当然要被牵着鼻子走；三是将中国和西方人为的对立起来，步入了一“正”一“负”的对立思维。如果这些批评不违背费正清教授的原意的话，或者说对其论断没有实质上的曲解的话，应当说“冲击反映”模式自有其片面的地方。有鉴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在中国

发现历史”的新的研究路向，试图纠正“冲击反映”模式的偏颇。然而，在近代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进程中，过分去强调中国本身的历史演化，将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影响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这不就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了吗？显而易见，纠偏者又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另一种偏。由此看来，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以哲理的概括并找出一个普遍都能接受的范式，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行不通的。

严复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对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的演变有过深刻而颇富启发的理性思考。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称：“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71页）严复在这里一是强调近代中国的变化无法阻挡，前无古人；二是认定世道的变化是各种力量相互交织，最后“运会”的结果；三是一旦“运会”来临，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里的“运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究竟指的是什么，严复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解释。如果我们将“运”看作一种机遇和时世走向，将“会”解释为会通和融合，则借“运会”一词去阐释近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内在而必然的复杂关系，倒是颇具启迪意义的。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既是一种机遇的会通，又是一种世事发展必然趋向进程中无法回避的融合。世界在多方面甚至全方位的挑战和影响中国；中国在迎接世界潮流中，不断的挑战自我，新陈代谢，最后融入世界，当然也影响世界。“运会”一词似乎语义不够清晰，但不清晰的东西往往比清晰者有更多的包容性和解释的空间。何况近代中西

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来就是复杂多变和不清晰的，如果用“清晰”的词语来表述，常常会步入误区而不能自拔。运会，或曰会通，是百年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种常态，一种趋势。下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向为例，试做具体的阐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不像八国联军战争那样是一次直接侵略中国的战争，但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影响巨大。时人多以五四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不同演讲阶段的标志，殊不知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演化出后来的五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80年间，中国社会的追求目标相对比较单一，那就是一心学习和移植西方的东西，从来没有动摇过。期间，虽曾经历过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不同的递进层次，但眼睛向西的总体目光并没有丝毫改变。即使中国人学习日本，也是因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典范，旨在从日本引进西学。当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取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让中国以及全世界尤其是欧美所震惊。许多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甚至对西方文化也发生了疑问，个别人曾提出从东方文化中找出路。大哲学家柏格森碰到正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时，告诫梁启超别再崇尚西方文明，劝他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子、老子、墨子，这些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是在欧美兴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时颇为流行。梁启超等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归国后，很快由“西化”派嬗变成东方文化派，即抛弃过去单一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在融化西方文明研究理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重点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出路，由此逐渐聚集了一批思想家和专家学者，形成了后来的新儒家。当年叱咤风云的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这时也一反以往，呼吁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研究者常常习惯于批评他们的后退或保守，

却往往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新的思想潮流对他们心灵深处的撞击和文化选择的制约。不从世界看中国，就很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尴尬境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冲击波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使风行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由宣传转向了实践。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反映更为剧烈而久远。李大钊敏锐地把“十月革命”称之为“第三种文明”，并宣称最适合在中国推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的全力推进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迅速集结了一批中国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沐浴着五四运动的春风很快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富竞争力的新的政治力量，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实事求是地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世界与中国的“运会”，于此可见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可以给中国注入新的文化因子，改变原来既定的社会演进方向，除了外在的世界因素之外，还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机制有了这种需求。简言之，是中国社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互作用，合理“运会”的结果。当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人的目光引向世界之后，中国人急切想知道的是中国究竟在哪些地方不如西方，并且简单的认为只要找到了问题所在，就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觉得是技术不如西方，于是有洋务运动；后又认识到“洋务仅是皮毛”，于是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结果还是难如所愿，于是又推翻清朝，构建民主共和；结果不但盼来的是一个假共和，而且又衍生出一批十恶不赦的军阀，混战掠夺，民不聊生，国家一天比一天坏。中国人简直到了无计可施的绝境。痛定思痛，反思过去，着眼世界，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中国社会的走向由一元变成了多元。没有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这种渴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想对中国发生影响也是不可能的。还是前引严复的话深刻：“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虽然加入了新的元素，出现了新的内容，但原来主张

效法欧美的“西化”派仍然有相当的势力，这在五四后的中国社会更新中也持久的发生作用，甚至在三十年代前后演化出十分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这和对五四前中国社会的反思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因为在“西化”派看来，鸦片战争后的80年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问题不是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路向不对，而是中国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动摇，原因在于“西化”的不够、不彻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破产的结论，而只是西方文明发展中的一段弯路，一个小小的不和谐的插曲。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调整和起死回生，并进一步重新走向繁荣，

中国的“西化”派仍然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不断发展，依旧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成为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又一个侧面的影响。

总起来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的发展理路复杂起来了，以往的单一局面被彻底破坏了。而且，实际的社会历史状况比历史学家笔下的描述要更复杂多变，难以琢磨。即使如上所述的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和“西化”派，也十分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似新未必新，看似旧未必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变了。